大不同，故應警惕簡單套用「殖民當局完全控制」的模型。另一方面，需分析群體之間的差異：一是避免泛化「閩南人」「福建人」的概念，可進一步區分廈泉漳、宗族、僑商等亞群體；二是關注文化能動性的差異，如閩南的吸菸文化與社交禮儀如何影響地域鴉片生意的取向等。

總體上，該著在理論創新上邁進一步，不失為一部討論全球資本主義興起期間政權與商業關係的優秀著作。

陳曉祺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Locusts of Power: Borders, Empi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y SAMUEL DOLBE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316*pp.

范德堡大學教授 Samuel Dolbee 撰寫的 *Locusts of Power: Borders, Empi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核心觀點為蝗蟲不僅是災害象徵，更是奧斯曼帝國晚期賈茲拉環境、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遷與社會轉型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蝗蟲既是影響人類遷徙和造成飢荒的害蟲，也是人類投射焦慮、恐懼和希望的文化隱喻。此書作者長年從事中東史與環境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亦是近年來奧斯曼帝國晚期環境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著作。

除序言和結論外，主體分為4章。序言介紹賈茲拉（Jazira，即當今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地帶，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範圍包括阿勒頗、迪亞巴克爾、摩蘇爾等省的部分區域）獨特的農業生態和蝗蟲的生物特點，指出賈茲拉雖乾旱高溫但有發展旱作農業的潛力，問題在於當地的蝗災制約農業發展。在作者看來，蝗蟲能「說話」，它們通過對棉花種植、難民安置、乃至政治變革的影響，展現對現實的衝擊。同時蝗蟲也常「為人代言」，被用來指代各種人群，從遊牧的沙馬爾人和庫爾德人到亞美尼亞和亞述的難民，從權力到災害戰亂。奧斯曼帝國官員用蝗蟲隱喻桀驁不馴、難以管理的遊牧民和難民。而種族屠殺和戰爭的倖存者也用蝗災隱喻當權者和國家暴力帶來的災害性影響。可以說蝗蟲代表了賈茲拉不同群體的歷史觀察視角。

第一章「開闊地的蘇丹」聚焦1858—1890年間的沙馬爾人和奧斯曼帝國的坦志麥特改革。奧斯曼改革派官員視賈茲拉為待改變的「沙漠」，希望通

過發展棉花種植業和使牧民定居來進行改革。但這些改革均被蝗蟲與其隱喻的牧民沙馬爾人挫敗。蝗蟲啃食阻礙了美國內戰期間賈茲拉棉花種植業的發展。沙馬爾人為逃稅和拓展利益而發展畜牧業和抵制羊毛的競品棉花。相比便於徵稅管理的耕地，在省界處發展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業利於牧民遷徙以逃稅。奧斯曼帝國試圖建立佐爾區和「警戒線」來限制蝗蟲和牧民的活動，但均未成功。車臣難民在拉斯安的定居也因蝗蟲和牧民的阻撓而陷入困境。作者還揭示了奧斯曼官員和遊牧首領通過對「領土」的不同翻譯命名進行的權力鬥爭。沙馬爾人反對設立佐爾區的叛亂被奧斯曼帝國鎮壓，但賈茲拉蝗蟲與牧民的問題依然存在。

第二章「野蠻的蝗群」將重點轉向1890—1908年間庫爾德人組建的哈米迪耶輕騎兵團。1890年奧斯曼帝國開始扶持庫爾德人組建哈米迪耶輕騎兵團來加強邊境治理。通常學界認為哈米迪耶輕騎兵團是為抵禦俄國入侵或防止亞美尼亞人叛亂而設立，但作者認為易卜拉欣帕夏領導下的哈米迪耶輕騎兵團實際上向南影響到賈茲拉。本章詳細描述了庫爾德人與沙馬爾人之間的衝突，以及省界在這些衝突中的重要作用。外來騎兵團的庫爾德人與原住牧民沙馬爾人圍繞省界、出於爭奪牧場、拓展利益等動機爆發衝突。蝗蟲催化了這一過程，破壞牧場迫使庫爾德人遷徙，為哈米迪耶輕騎兵團首領易卜拉欣帕夏領導庫爾德人侵佔沙馬爾人的牧場和省界農耕定居者的土地與財富提供合理藉口。迪亞巴克爾的地方權貴們將易卜拉欣帕夏比作蝗蟲，指責他以蝗災為藉口擴張自身財富和權力，通過操縱電報網絡來抵制他的影響力。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期間，易卜拉欣帕夏死於政治動亂，但其死亡也引發沙馬爾人像蝗蟲般集結，對亞茲迪人進行屠殺和掠奪。同年的奧斯曼帝國國務檔案顯示一場來自賈茲拉方向的蝗災摧毀了阿勒頗省的農作物。

第三章「我們不就像那些生物嗎？」研究1908—1918年間，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亞美尼亞流亡者與蝗蟲在賈茲拉命運的交織。作者將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置於奧斯曼帝國治理賈茲拉的漫長歷史背景中來研究。亞美尼亞流亡者面對屠殺暴力，無力地自比被碾碎的蝗蟲。同時，種族滅絕削減了人工捕殺蝗蟲卵的勞動力進而加劇蝗災。奧斯曼帝國展開大規模蝗蟲防治行動。環境成為管理和抵抗統治的工具，奧斯曼帝國藉助惡劣環境滅絕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也藉助環境的機遇進行抵抗，這一時期，奧斯曼帝國議會對遊牧、民族性和蝗蟲的辯論，反映了民族主義觀念的興起及其對賈茲拉邊境的複雜影響。

第四章「像蝗蟲的族群」聚焦於1918—1939年奧斯曼帝國解體後的時期，重點關注亞述難民安置和民族國家建構。英法兩國在賈茲拉建立委任統治後，隨着新型化學殺蟲劑的使用和跨國區域合作的加強，蝗災得到有效管控，為安置難民提供良好的生態與經濟環境。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進一步增強，該地出現民族自治運動。最終賈茲拉成為敘利亞的重要糧倉。

結論總結了蝗蟲對賈茲拉邊界、環境和身分的深遠影響與蝗蟲隱喻群體的歷史延續性。改革後蝗災基本消失，但也產生很多歷史遺留問題。

作者運用大量阿拉伯語、英語、法語、德語、現代土耳其語和奧斯曼土耳其語的檔案、回憶錄、報刊、文學、詩歌等文獻，並按空間分布去梳理分散於不同奧斯曼省份與民族國家中的蝗蟲文獻，發現其中由蝗蟲串聯的歷史與生態延續性。其主要學術創見為：

其一，超越傳統的民族主義視角與人類中心主義視角，揭示改革的負面影響與歷史發展的生態連續性。國際學界研究中東環境史的改革有兩種路徑：一是揭示改革對中東的生態環境及其他方面的負面影響；二是揭示奧斯曼改革並非單純受西方殖民影響，而是奧斯曼帝國上下內外共同協商對話推進的變革。本書不同以往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將坦志麥特改革視為進行世俗化與現代化的積極過程，揭示了坦志麥特改革對賈茲拉環境、民族與社會的負面影響。定居農業改革阻礙了遊牧部族通過遷徙應對蝗災的努力。同一自然區域內省界犬牙交錯分布與不合理劃界改革，給牧民遷徙逃稅提供機會，增加鄰省行政糾紛，阻礙了賈茲拉鄰近省份官員整體協同管理遊牧部落、協同控制蝗蟲的努力，最終加劇蝗災影響。同時種族強制遷徙與暴力屠殺也深刻影響着賈茲拉的社會穩定。書中引入「環境東方主義」概念，批判歐洲和奧斯曼官員將賈茲拉視為「荒漠」並歸咎於當地遊牧民的偏見，揭示殖民話語如何構建和利用環境敘事。

其二，體現奧斯曼帝國研究理論範式新轉向。不同以往的衰敗論敘事，本書承接 Alan Mikhail 帝國研究的環境轉向範式，從環境史角度研究賈茲拉的遊牧到農耕的社會轉型。在轉型論問題上，為奧斯曼帝國晚期史的學術對話作出重要貢獻，例如 Nora Elizabeth Barakat 關於奧斯曼帝國對遊牧遷徙的貝都因人的土地法改革研究；Chris Gratien 對奧斯曼帝國邊境地區丘庫羅瓦的生態轉型的研究；M. Talha Çiçek 對奧斯曼帝國與阿拉伯遊牧民之間複雜關係的研究；Vladimir Hamed-Troyansky 有關奧斯曼帝國難民安置制度對俄奧邊境的根本性變革影響的研究等。

其三，還原消失歷史記憶，以史為鑑的價值取向。本書承接 Kate Brown 對多元民族混合地區的歷史演變、空間融合、民族認同的研究，跨越奧斯曼帝國省界與民族國家界限，從自然地理空間研究賈茲拉。突破了傳統學界對該區域的研究框架，還原了近幾十年來賈茲拉從地圖與民眾記憶中消失的歷史。賈茲拉暴力極端與環境破壞的歷史仍在延續，伊斯蘭國和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在該地崛起，還存在殺蟲劑污染與農業乾旱等問題。作者通過長時段研究揭示改革負面影響，並對現實中某些國家意圖推行歷史相似的民族遷徙政策提出警醒。

總體而言，該書史料翔實、邏輯嚴密、理論前沿、以古鑑今，追溯了省份劃界與農業轉型改革對賈茲拉的歷史影響。不僅豐富了奧斯曼帝國晚期改革史與環境史的研究範式，為後人進行中東環境史研究提供理論路徑，而且給讀者一個新視角，讓他們超越民族國家界限與人類中心主義，從環境管理作為國家治理與民眾抵抗工具的角度，觀察奧斯曼帝國晚期歷史。此外，本書尚有一些可繼續推進之處：第一，從中國中東史研究來看，或可借鑑本書環境史理論，結合中國的中東研究理論如文明交往論等推進研究。第二，本書以蝗蟲這種動物展開研究，後來者或可從環境史中的植物角度推進研究。

趙震宇
陝西師範大學中亞研究所

郭靜云，《商文明的信仰世界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281頁。

近年來，一系列系統、科學的遺址調查與發掘工作積累了豐富的考古資料，為重構上古歷史提供了扎實依據。這些新資料不僅拓展了對三代時期不同區域、不同階段社會形態的認識，也使學界能夠從生產技術、物質文化與精神觀念等多重視角，更全面地探討早期國家的形成與演進機制。儘管中國上古史研究已取得突破性成果，展現出廣闊前景，但仍面臨諸多根本性挑戰。如中國青銅時代的歷史圖景雖呈現多元面貌，但代表精神文化的禮器造型和紋飾卻為何高度相似？這些禮器背後隱藏着什麼樣的精神世界？其與後來中華文明傳統思想又有何種淵源關係？這些基礎問題背後，實際涵